

第9卷第2期 2016年4月

Vol. 9, No. 2, April, 2016

国际高等教育

排名竞赛

又一年，又一种方法：排名带来了新东西吗？	41
更快、更高、更强：全球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的“奥运会”吗？	43
良好的高等教育国家体系：来自“U21排名”的讯息	46
欧盟“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与拉美大学	48

难民危机和高等教育

叙利亚难民危机与高等教育	50
德国大学为难民敞开大门：准入障碍仍然存在	52

腐败与学术文化

高等教育欺诈与腐败带来的灾难	54
东亚“毒性”的学术文化	58

国际主题

国际高等教育和“新自由主义转向”	60
联合国、国际高等教育和知识外交	62
国际教育研究变化的格局	65
人文教育的传统及其全球相关性	68

学生问题

新民族主义：国际学生面临的挑战	70
东南亚学生流动面临的挑战	72
法国对国际学生学费的讨论	74

国家和地区

微观下的英国教学质量：驱动力为何？	76
科索沃的高等教育：漫长的过渡	78

新书速递	80
------------	----

又一年，又一种方法：排名带来了新东西吗？

Ellen Hazelkorn , Andrew Gibson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高等教育署 (the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 政策顾问、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小组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名誉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Andrew Gibson: 爱尔兰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小组资深研究助理、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Andrew.gibson@dit.ie

以前，每当谈及大学排名，有人就会问“是哪一个排名？”尽管现存十大主要全球排名，但人们的关注点大都集中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cademic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泰晤士高等教育》杂志“THE 世界大学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QS 世界大学排名” (QS)。然而，即便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又有人会问，“是的，但到底是哪一个排名呢？”这是由于这三大排名已提出了 66 项独立排名及子排名：地区排名、教师排名、学术领域排名、学科排名等。所有种类的排名都体现出大学排名不仅具备新闻价值，也具备巨大的商业价值。

政策与媒体习惯于关注由排名的上下浮动带来的精彩剧情，即便此类变动在数量上并不显著。甚至，学生在做择校决定时也会参考此种细微差别。事实上，可以说正是此种炒作行为推动了排名数量和种类的激增，特别是排名的发布周期，似乎都是与重要会议及事件相吻合的。

排名机构会反驳任何蓄意作为。例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的“世界大学排名”认为调整是进步的象征，或者正如 THE 宣称的那样，“改变是为了做得更好”。THE 就其合作伙伴关系的

变化也做出了解释，包括：THE 与 QS 分家、THE 与汤森路透 (Thomson Reuters) 进行合作、THE 近期与斯高帕斯 (Scopus) 合作。

近来排名方法论的变化

方法论变化有两大主要形式。改变可以是结构性的：比如对指标权重、具体指标或标准归一等进行一些调整。改变也可以体现在原始数据的变化上。尽管如此，这些变化都更好地说明了排名在其方法论和权重上的随意性。

关于原始数据，THE 在 2015 年将原采用的“科学网”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替换为斯高帕斯数据库。较之于斯高帕斯数据库囊括的 23000 本期刊，“科学网”数据库仅包含 12 000 本期刊。人们认为斯高帕斯数据库对于人文社科领域的覆盖范围更广，也因此涵盖了高校在更多学术领域及学科中的活动，逐步消除了文献计量学指标中的科学偏见。

另一变化则是，THE 决定把多于 1000 位作者的文章排除，因为此类文章会为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带来巨大的意义。这一变化主要影响了诸如粒子物理学这一类的学科，例如欧洲核研究组织的项目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由于完整数据集不可用，我们只能认为排除这类文章导致了土耳其博阿济吉大学（Boğaziçi University）大学排名的急剧下降，该校从2014~2015年的139名下降到2015~2016年的501~600名。这就引发了以下问题，是否此类排名研究应彻底不被认可，是否另有替代系统可作为更加公平且合适的解决方案。

2015年，QS对其排名方法进行了调整，称之为“改进”。此次调整涉及到如何计算被引数。QS构建了一个通过学术领域分类来标准化被引频次的模型，以此取代通过研究人员绝对数量来对被引数进行分组的做法。这一举措使得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研究数量与医学和生命/自然科学领域齐平。这意味着那些拥有医学院的大学（它们通常历史悠久且具备较稳固的科研声誉）不再占据优势，而那些在其他学术领域有其优势的新兴大学的排名位次可能会有所上升。作为对THE排名变化的一个回应，QS也把有多于十所院校合作发表的文章排除在外。

相比之下，ARWU的排名方法相当稳定。因此，大幅波动并不常见，排名靠前的学校长期不变。ARWU在2014年和2015年做出了一项有关计算高被引论文数（来源于汤森路透）的调整，专门针对同时在两所院校工作的研究者。自2003年起，ARWU采用的是一份有6000名高被引研究者的名单，但到了2014年和2015年，ARWU引入了一份较短的包含3000名研究者的名单。这引起了总分上的小变化，但并未带来大幅波动。

俄罗斯的“弧形大学排名”（Round University Ranking, RUR）采用汤森路透提

供的数据。科研和教学各占40%的比例，“国际多样性”和“财务稳定性”各占10%。该排名有趣而并非具备突破性的一点在于，每个大学每项指标的分数都是可用的。这使其成为在原本拥挤的排名市场中一个有趣的选择。

这些变化为我们带来了新东西吗？

大量国际证据表明大学是如何试图操控或（更礼貌地说）影响其数据的。教师数量是科研收入、研究学位学生、发表文章、生师比等数据的分母，因此，在依据合同和就业状态对教师进行重新归类上，大学已做出了不懈努力。大学也致力于清理一些错误的机构隶属关系。大量证据也表明，大学正努力提高学生入学的录取标准，这带来了对学生学业完成率、就业率及薪资水平的连锁影响。尽管听起来不错，但这些例子在全球1800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计划中，影响力仍相对较弱。

尽管有所变化，但排名是否正在告诉我们那些未曾知道的东西，这一点尚不明确。大学改变得如此之慢，因此，想要知道年度排名中所体现出的大学水平变化实际是否归咎于学校本身的努力，这还是相当困难的。讽刺的是，排名的波动问题可能会掩盖逆向问题：排名的相对同一性。尽管变动出现，排名却非常一致；不同院校可能会以略微不同的名次出现，但根本上说来，在所有排名中，几乎都是相同的院校出现在或是接近于领先位次。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排名基本上都是在测量同样“错误”的东西。

大学排名顽固的“黑匣子”本性是由于政府、学生及公众对其本质的不了解或是不予质疑所产生的。

更快、更高、更强：全球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的“奥运会”吗？

Maria Yudkevich, Philip G. Altbach, Laura E. Rumbley

Maria Yudkevich: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学院(the 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 副校长

电子邮箱: 2yudkevich@gmail.com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科研教授及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Laura E. Rumbley: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箱: laura.rumbley@bc.edu

隐喻的含义

对全球大学排名来说,有许多隐喻适用且常被应用在其之上。在我们看来,全球大学排名蕴含着许多“竞赛性”特质,并且在这些主要的学术“竞赛”和另一个关键的全球性竞赛——奥运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类比性。

排名与奥运会一样,都具有极强的竞争性,为参与者提供获得备受推崇的奖项或是奖励的机会,以深刻且具体的方法塑造其未来的发展。对于运动员来说,竞争为其带来国家和国际性的荣誉,并为其提供获得丰厚代言费的机会。同样,在全球大学排名中,表现出色的大学获得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得到潜在学生和教师的关注;获取私人资助机构、企业、慈善家以及政府提供的资金。

全球排名“竞技场”

奥运会和全球大学排名都把这样的参与者汇集到一起,他们崇尚世界性舞台上的高水平表现,他们渴望通过竞争获得成功。然而,在这些比赛中,并非所有的参赛者都是平等的。想要在精英竞争中表现良好,聪明

才智和丰厚资金都十分有益。同样,熟悉比赛规则、有参赛经历也相当重要,因为成功得益于扬长避短。

另外,先天条件或许也能解释一些国家在奥运会中取得的成功,这同样适用于大学排名。例如,某个运动项目的奖牌得主名单表明获奖者所在国拥有适用于这些运动项目的得天独厚的训练条件。先天优势在排名中的影响也同样明显。最明显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较之于那些非英语国家,世界上的英语国家和院校处于更有利的位置(相对于排名而言),因为他们的学术系统已使用全球科学语言运行,这些学术系统涵盖了诸多顶尖科学出版物,也拥有决定这些出版物文章录用结果的审稿人。

奖牌数量：力争金牌

排名位次与奥运会奖牌一样,都是一场零和博弈。奥运会中有金牌、银牌、铜牌各一枚。在全球排名中亦是如此。排名中仅有一所位居榜首的大学,也只有前100所大学被称为世界百强。尽管如此,事实上,卓越并不局限于一定数量的大学之中,任何一所大学都可以拥有卓越的权利。

一些国家付出大量努力以成为严肃认真的参赛者：既是在排名也是在诸如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中，并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他们将能在这些赛场中的获得最佳表现称之为国家重点计划，并认为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对于政治动态来说相当重要。在许多国家中，包括中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一些大型或高等教育“卓越计划”明确把在排名中的更好表现作为重要目标。国家汇聚资源以在大学国际竞争中取得成就，这与国家激励运动团队参加奥运会并没有两样。

优秀源自优秀：对“供料系统”的需求

在世界运动精英及世界顶尖大学中，很难有来自实力较弱系统中的“赢家”。这突显了重塑整个体系的重要性，它最终能激发杰出的表现。为在排名中占据领先地位，很有必要对顶尖大学进行投资；同样，对于这些最具竞争力大学所处的广泛的学术体系，投资也很重要。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最好的国立大学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新学术人才供应。同样，要在奥运会中具备竞争力，必须有功能完善且有充足资金做保障的基础设施，以支持儿童发展和青年体育。此外，有实力的大学想要充分发挥其潜能，它们需要在具有竞争力的环境中运行。理想情况下，这些学校必须与其他大学积极竞争，获得生源、资金和教师。如果没有体验过当地和国家层面上的竞争性环境，大学很难在国际层面上具备竞争性。在体育运动中也是如此：与某一领域的最佳选手共同练习及相互竞争的机会带来了雄心勃勃的冠军，他们获得了发现劣势、强化技能以及勇创新高的重要机会。

在吸引人才方面又是一个类比，可用于在奥运会表现良好的国家和那些拥有强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国家之间。在奥运会中，国家队代表的是一个特定的国家，可能包括来

自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或教练/训练员），他们获得了居住国的公民身份并作为合法的“国家队员”加入了国家队。世界上的许多大学同样也在为其“团队”吸引顶尖人才，以在全球大学排名中提升其竞争力。

光芒不再：夺金竞赛的阴暗面

令人伤感的是，我们周围的竞赛有着阴暗面。从职业足球界的腐败到奥运会中自行车比赛服用违禁药品的长期文化，都清晰表明并非每个人都在公平竞赛。所以，运动员可能会沉溺于服用药品以提升表现，同样，世界大学排名中的“表现增强”策略包括在虚假的盈利性期刊上发表文章，这类文章常被错误地计入主要数据库，如科学网（Web of Science）和/或斯高帕斯数据库（Scopus）。同样，我们必须承认，一些排名机构把商业收入看得与客观评测大学质量一样重要。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行为？与在奥运会竞技场上一样，在排名中获得成功需要获胜的坚定承诺，并且，失败可能带来的后果与代价也足以促使参赛者尽力确保完美的结局。

更快、更高、更强——正确的口号，错误的竞赛？

更快、更高、更强——谁不被如此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口号所激励呢？然而，颁发不同等级的奖牌是基于运动员在奥运会竞赛中特定某天的表现，那些世界顶尖运动员或许会对此表示满意，但是评估世界范围内的大学的成就必须超越等级分明的领奖台或是位次分明的列表。大学追求卓越的承诺——更快、更高、更强——应是基于对大学本身复杂且多面本质的深刻理解，同时也是基于对大学应如何不断完善自身、造福社会的仔细审视。我们需要以一种周密、稳定且可持续的方式把这些最为基本的努力延伸到镁

光灯和颂歌的光环之外。同时，人们还要意识到，并非所有大学都应关注“奥运会水平”的竞赛，它们关注的应该是提供更多教育机

会、更好地培养学生并服务于当地和区域的需求。排名，正如奥运会一样，只是少部分具有超高竞争性的参赛者的所属园地。

良好的高等教育国家体系：来自“U21排名”的讯息

Ross Williams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墨尔本应用经济和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电子邮箱: rossaw@unimelb.edu.au

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本质和质量，而不仅仅是研究型大学的质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国际大学排名主要基于科研绩效，极大地忽略了教学和培训、学生学习状况与社区参与情况。这些排名正在影响大学的行为——特别是在欧洲、亚洲及大洋洲地区，并使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性减少。

“U21排名”方法论

为试图将讨论焦点从院校延伸至整个高等教育系统，U21组织的成员院校于2012年设立了一个量化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绩效的项目。该项目囊括了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即那些在高中学业结束后提供至少两年学习项目的院校。项目包含了50个国家，涉及的人均收入范围较广，涵盖了以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和那些收入较高的发达国家。各国教育系统绩效的评测依赖于25个变量，这些变量被分为四大模块：资源、政策环境、连接性/参与、产出。资源评测标准包括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私人 and 公共支出以及生均支出。政策环境评测标准包括院校财务和学术独立的程度、院校多样性、标准监控以及商业观点。连接性评测标准包括与企业合作发表的论文、与国际学者合作发表的文章、网络联系、商业态度调查、国际学生相对重要性。产出评测标准包括科研绩效、参与度以及一国排名前三大学的地位。

关于毕业生质量的国际比较数据难以获取，但是通过毕业生（相对于辍学学生而言）失业率评估毕业生群体及毕业生标准是否满足社会期待的数据是可用的。

对照最优表现100分的满分，每个评测标准的分数都是标准化的。然后，每项评测标准在经过衡量后设定分数（从100分中取出），再根据四大模块进行排名，最后得出总分和名次。在总分中，40%来自产出，剩下的资源、政策环境、连接性/参与等三项各占20%。该排名（不是分数）的一个缺点在于它未将所有国家包括在内，这就意味着，特别是对那些参与了此项排名且教育系统较不发达的国家来说，他们在这一排名中的表现被夸大了（因为这些大学没有被置身于全球背景中进行比较）。

评测标准的政治用途

和大学排名的情况一样，大多数媒体的兴趣都集中在整体的国家排名。而正是排名指标模块及单一变量的分数和名次，以及以上两者间的关系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讯息。

充足的资源与良好的政策环境对于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国家系统必不可少。探究两大投入模块（资源和环境）与效果模块（联系性和产出）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中获得相关资讯。在产出变量中，参与度、人员资质率与支出紧密相连，但支出是否主要来源于于

政府财政（如北欧国家）或是个人（如韩国）并不重要。另一方面，科研绩效与大学在研发上的支出联系密切，这类支出大都由政府资助。教育系统总体效率的评测标准是为了对比一国在产出（科研绩效）和资源上的排名。结果显示，科研绩效排名大幅高于资源排名的两个国家分别是英国和中国。在这两国中，政府科研经费只针对那些少数极好的学校，表明这是一个提升科研绩效的快速方法。连接性也与资源高度相关。

各国正在趋同吗？

在发布了四次年度排名结果后，各国间一些趋势相当明显。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指标上都有持续进步，所以，一国想要保持其位次，它发展的速度必须高于平均水平。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过去四年中国家高等教育体系趋同。排名总分的标准方差被用来评测趋同性，实际上，总分表明各国高等教育体系差异性小幅增加，而仅有连接性这一模块中出现了趋同。但是，整体结论掩盖了个别国家的巨大进步。进步最大的是中国和南非；智利和匈牙利也在排名位次上有所上升。位次下降的国家包括乌克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西班牙以及土耳其。在单项评测标准中发现了一些趋同现象，例如，参与度及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等。

哪个系统表现最佳？

那么，最佳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哪一个呢？没有任何一个系统可以做到最优。北欧

国家表现良好，其大学、政府及商业合作相对紧密且在研发上支出较多；同样，瑞士的良好表现尤其得益于其密切的国内外联系。在通信线路更为复杂的巨大经济体中，最佳模式是否是可实现的，或是值得拥有的，这一点并无实际意义。在资源分布的另一极端，美国的系统权力更为分散，对于政府资助的依赖更少，但美国综合排名第一。因此，从排名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结论：超强的政府控制加上低水平的政府资助带来的是表现最差的高等教育国家系统。

在制定国家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观察那些规模和收入水平一致且在排名中表现良好的国家的特征。高等教育“良好”系统的特质部分依赖于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收入水平较低时，需要提升教学和培训；科研最好是用于引入和传播新知识。在一个附加的“U21 排名”中，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家进行了评估。中国、印度和南美在此评测标准下名次有了显著上升。

另一方面是去探究诸如连接性、资质水平及科研支出等评测标准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可能需等待几年才能给出以上问题的答案。理想情况下，我们需要在此排名评测中纳入更多低收入国家，然而也需要更为完善的数据。

注：领导“二十一世纪大学协会排名”项目（Universitas 21 [U21] ranking project），详细信息可见 www.universitas21.com。

欧盟“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与拉美大学

Ana García de Fanelli

阿根廷国家和社会研究中心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tate and Society) 资深研究学者

电子邮箱: anafan@cedes.org

“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U-Multirank)调查于2014年首次发起。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以用户为主导的高等教育国际排名方法,包括世界范围内850所高校,一些学校位于拉丁美洲。这一举措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和资助。

与“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或是“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ranking)等不同的是,“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主要关注科研活动。它也关注高等教育维度的多重性,比如教与学、知识迁移、国际化以及地区参与。此外,最重要的是,用户在比较多个大学时,可以选择包含哪些绩效领域。除了其他国际排名常采用的数据外,“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也收集学校(通过院校问卷)和学生提供的信息(参与院校的学生调查)。

遗憾的是,仅有少数拉美大学的非科研指标是可得的。本文讨论了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更多拉美院校能参与到这一有趣且重要的排名中来。通过分析“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在院校问卷中所需的一些数据,接下来本文会讨论类似的拉美项目。

拉美国家的相似经历

为回应以科研为导向的国际排名,拉美

大学已开始参与到国内和国际项目中,为其运作和产出的多种维度提供数据和指标。

欧洲共同高等教育领域拉美高等教育机构综合信息系统(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ystem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Latin America for the Common Higher Education Area with Europe,以下简称为INFOACES)属于拉丁美洲学术训练项目(Latin American Academic Training program)中的一部分,由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资助,与U-Multirank的目标大致相同。该网络由来自23个国家(18拉美国家,五个欧洲国家)的33名成员组成。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th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Valencia)负责协调这一项目。INFOACES的网页为用户提供了大学的基本信息及其网站;各学术领域授予的学位列表;在校学生总数(基于数据可得情况,或为每个学位项目中招收的学生数量);学校教师数量。从属该网络的会员院校可以进入限制性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包含更多详细信息,以供大学进行管理决策。会员院校也可以进入“知识社会中的灵活专业”(the Flexible Professional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这是一个通过在线调查来运行毕业生检测系统的平台。

尽管墨西哥的高等教育机构为数不多,

但是,“墨西哥大学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an Universities),即一个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the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提供的数据库,为人们带来了更多信息。“墨西哥大学比较研究”的网页为用户提供了关于教学、科研及经费方面的比较信息。它甚至还提供了与墨西哥质量保证政策相关的具体结果,比如说国家研究人员系统(National System of Researchers, SNI)的认可项目和研究人员数量。EXECUM包含了某些领域较详细的信息,如科学技术领域;而在诸如教学过程和产出等另一些领域中,信息则是少之又少。

院校问卷中所需的数据

拉美现有的举措对“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吸收更多高等教育机构信息,是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要从大部分拉美院校获得问卷所需的教学投入与产出和财务问题等信息还是相当困难的。

例如,各院校关于国际学生(尤其是新进学生和参与国际交流项目的学生)的整体数据难以获取——实习学生数量以及在常规学业周期毕业的学生数量。在毕业生数据上,拉美的大学(除少数智利大学外)大都缺乏查明校友是否继续深造或是开始就业的跟踪系统。一些拉美大学拥有某个学位项目的毕业生监测系统,但它并未得到系统实施。一些关于资金的数据很难获取,特别是大学每一类的总收入(核心预算、学费、科研带来

的外部收入、许可协议收入)。这类数据在私立大学更难获取。最后,拉美大学的经费如何真正地分配到科研、教学及知识迁移活动中,这一点尚不明确。

当然,我们应该了解的是,拉美高等教育系统数据的量和质在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类别的院校中各不相同。

结语

拉美院校在收集此类数据和指标上面临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成为“多维度全球大学排名”或是其他类似项目的一部分,以提升未来高等教育的透明度。为达成这一目标,针对参与项目的拉美大学,需要有合适的激励措施(增加潜在收益、降低透明度的代价)。大学也应提供适当的技术、人员及财务资源以产出这些信息。

有关高等教育系统的信息具备公共物品的特质:它既是非排他性也是非竞争性的。如果此类信息真的是公共物品,那么政府有责任确保提供此项服务。每个拉美大学依靠自身举措来提供一定数量和高质量的数据以满足高等教育数据的社会需求,这一点似乎不太可能。这些学校尤其不可能持续努力以定期收集关于教学、学习产出和国际化的数据。为达到这个目标,通过资助机制和其他激励措施,拉美政府必须参与这一创新型事业并鼓励大学,从而获得基于绩效指标的信息并定期发布。

叙利亚难民危机与高等教育

Hans de Wit、Philip G. Altbach

Hans de Wit: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Philip G. Altbach: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快速升级的欧洲难民危机已持续几周占领国际新闻头条,但出人意料的是,高等教育界最近才开始关注自己在危机中的角色并考虑其即将面临的巨大困境。思考难民危机引发的高等教育需求及挑战相当重要。

大量难民离开家园,他们主要来自叙利亚,部分来自厄立特里亚、利比亚、阿富汗、库尔德地区和伊拉克等地,数量成千上万。鉴于多年来试图从非洲移居到欧洲的人数众多,汹涌的难民潮引发了移民数量的再次上升。此次大规模迁移的动机既带有政治性,也带有经济性:难民们正在逃离自己国家的恐怖主义、内战和贫穷。过去数年,非洲难民试图跨越地中海进入欧洲,这被视为是一次源于经济困难的人类危机,此种迁移少有获得接受国及其社群和政府的支持。而对于来自中东,特别是叙利亚的新难民潮来说,尽管诸如匈牙利等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不那么热情,但至少在西欧,这次迁移似乎得到了更加积极的回应。

中东难民的人力资源潜能

为何情况会是如此?首先,叙利亚难民逃离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阿萨德政府和伊斯兰国在当地人民身上犯下了弥天大罪。这些难民似乎更像政治受害者(这引起了接收

国的同情)而非经济难民。伊拉克和库尔德地区的难民也是如此。此外,就教育而言,人们认为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库尔德地区的难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此更易融入接收国的当地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在当前的人才竞争中,这些难民不仅是受害者和当地经济的一个成本要素,而且从长远来看,他们是知识经济的新型人才。

许多媒体报道宣传了:来自中东的口齿伶俐、英文流利的年轻专业人士表示希望继续其学业或是获得技术性工作,并为欧洲经济做出贡献。

虽在配额和容纳能力的问题中痛苦挣扎,但德国正在把握潜能,而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以更复杂的方式制定其政策。尽管人道主义因素在现有的官方宣言中理应占据主导,但德国当局明确指出,这些难民也可成为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短期、特别是长期的人才资源。德国大学希望接收正在进入该国的800 000名难民中的10 000人。

至少就现在而言,还没有关于潜在的叙利亚及伊拉克“人才流失”问题的讨论。眼前的挑战掩盖了长期的影响,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欧洲及其他工业化国家在保留较贫穷国家的人才上并未表现出任何的道德关怀。文献中充斥着关于“留存率”和利

用外国人才的讨论，但却丝毫不关注这些国家的需求。尽管人们或许希望，在国内局势改善的情况下，教育背景良好的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会返回祖国，但数据表明，事实上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学术界的责任、挑战和机遇

在一些国家，学生、学者、大学和政府正开始探索一条道路，将年轻的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学术难民、学生、学者和老师融入自己的教育系统。通过增加奖学金数量、加速资质认证过程、提供语言培训和诸如宿舍等基础设施，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把难民问题放入高等教育议程中、提倡给予更多的奖学金和后勤帮助，在这些问题上，诸如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the 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DAAD）、荷兰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协会（EP-Nuffic）以及美国国际教育学院（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等组织影响巨大。

大学本身至关重要。它们在许多方面都能快速且独立地做出反应。它们可以削减繁文缛节，在招生过程、为难民学生开放学习区域、为受到创伤的学生及家庭提供咨询和其他服务上做得更好。由于大多数学生都缺乏合适的资质，大学可以通过考核测试及其他方式确定对学生的安排。在许多情况下，语言和文化培训也必不可少。

所有这些都需人力和财力。处于财务紧张时期，这并非易事。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诸如欧盟等组织能够且应该提供帮助。

我们必须指出另一个挑战，因为它是美国和英国，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政府的一大担忧。各国需要确保的是，那些被大学接收的难民是真的专注于教育而不会转变为安全危机。特别是对美国人而言，9-11 恐怖袭击的

记忆仍历历在目。

大学自身也将发现，对这一危机做出的积极回应也会带来巨大益处，这有利于校园的国际化，并为学术界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

接收国也有在本区域为难民创建特殊学校的计划。显然，伊斯兰基金会已开展了三项举措以在土耳其建立此类特殊大学。这类计划的挑战在于找到合适的教师，确保持续性及高质量的教育。创建新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困难且耗资巨大的过程。为受创伤的学生提供此项服务，尤其会存在问题。

结语

所有这些举措都值得称赞，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正如瑞汉·库萨（Riham Kusa）在 Al-Fanar 媒体（2015 年 9 月 1 日）中所写的一样，学生面临的困境在于把钱付给走私犯或是寻求奖学金之间。而不幸的是，第一种选择成功的可能性高于第二种。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就是增加这些难民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一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在高等教育中为难民提供足够的学习场所就越困难，人才流失带来的影响就可能会越严重。以往的经验表明，长期远离家乡的难民在完全融入新的社区后，返回祖国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界拒绝对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它们可以通过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场所和奖学金、为学者提供访学奖学金名额等举措做得更好。这适用于欧洲、北美及世界其他国家，当然也适用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卡塔尔，这些国家的参与度仍然很低，并且他们把重担都压到了黎巴嫩和约旦身上。

德国大学为难民敞开大门：准入障碍仍然存在

Simon Morris-Lange、Florinda Brands

Simon Morris-Lange：德国一体化和移民基金会专家委员会（Expert Council of German Foundations on Integration and Migration）科研小组副组长

电子邮箱：morris-lange@svr-migration.de

Florinda Brands：德国移民政策专家

电子邮箱：lorinda.brands@gmail.com

欧洲，特别是德国，在过去几个月中经历了一波巨大的难民潮。仅在2015年，在德国寻求庇护的男女老少就已创下历史新高，数量高达100万人，这对德国现有的管理途径来说，无疑是一大主要挑战。然而，巨大的挑战带来了众多机遇：大部分难民都不到25岁，在帮助德国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上，他们非常适合。在逃离祖国之前，这些难民就已经或是准备进入大学。由于许多德国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正为难民敞开大门，他们学习的渴望已受到关注。然而，对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法律和财务障碍带来了似乎不可逾越的挑战，所以，开始或是继续其学业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对德国来说，由于35%的难民有望长期居住在此，因此，如果现在不能移除障碍，未来的融合就很难实现。

法律障碍

尽管有关庇护程序和融合方法的问题大都是人道主义的，但德国境内就这些问题的辩论经历了重大的范式转变，且现在这些辩论主要基于德国未来的劳动力需求而开展。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德国冗长的庇护程序的规定受到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些规定致使成千上万年轻且积极的难民懒惰无能。相反如果难民能够更早地接受教育和培训，会促进

劳动力市场各领域的融合。难民不得不等待平均5.3个月，且在数千案例中难民的等待时间超过了一年，直到他们得知自己是否被给予了庇护地位。一旦有了庇护，难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并参加工作。

严格说来，在德国，高等教育准入的限制程度低于其他欧洲国家。现在，难民无需等待就可以进入德国大学的一项免费学习项目中。截止8月，德国的16个州都允许学校招收那些还未获得庇护地位的难民。虽然如此，在德国的大学课堂中仅有少数的难民学生，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庇护程序中强加了居住要求所导致的。在长达一个月的等待期内，难民需要居住在最初被分配的行政区域内。由于并非所有区域都有大学或是具备某一专业的大学，所以直到获得在各行区间自由活动的许可，难民们才能进入学校学习。尽管区域间的准入具备法律优先性，但相关的繁文缛节使大多数未来的学生怯于尝试。少数未被拒绝入学的学生通常以这样的结局收尾——他们没法证明自己拥有进入学习项目所需的资格证书。一般而言，德国大学要求国际申请者提供国外学校的毕业证书或是国外的学术文凭以获得录取。以上材料中至少一种需要与德国本土的学术凭证效力一致。所以，即便一位申请者把他/她的文凭带到德国，但在大学招生办看来，这一文凭可

能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

财务障碍

除法律障碍外，财务要求也为难民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尽管在德国大学学习仍是免费的（除去极少的一年两次约100至300欧元的管理费），但新进者需要担负学习材料和日常生活开支的费用，每月平均约为800欧元。然而，难民在其刚进入德国的15个月内禁止工作，直到其获得庇护地位，这一过程通常需要一年以上的的时间。结果，绝大部分的难民不得不接受非现金福利以及政府每个月212欧元的补助以维持生计。尽管学生们有政府资助的助学金（BAföG），但直到庇护案件确认后，难民才能申请此类财务援助。近期，政府许诺加速庇护程序，但这对于避难学生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因为避难学生要在德国居住至少15个月（原本是四年）才能申请此项助学金。最后，对于难民在银行开户上，德国有着限制性规定，这使难民在接收助学金、支付租金和大学学费上非常困难。所以，以上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新出现的解决方案

为帮助减少各类障碍，联邦政府、州政府、大学及公民社会主动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八月，德国联邦教育部和研究部（th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承诺在德国的预科大学（Studienkollegs）预留额外的2400个名额，

这些学校将为未来学生进入德国大学做好准备。与该举措并行的是，下萨克森州和萨尔州等一些州已经同意为熟练掌握德语技能的申请者放弃正式的招生要求，这些申请者已顺利完成了预科课程。同时，巴登符腾堡州为叙利亚学生提供了每月高达750欧元的50项奖学金，这些学生的庇护案件已被确认。此外，很多大学，如希尔德斯海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ildesheim）和拜罗伊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ayreuth）鼓励难民参加德语课程或是审计课程。另一些学校则做出了更大努力：慕尼黑的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the Ludwig Maximilians University）已开始把难民作为交换生进行招生，这样一来，在无需德语技能的情况下，难民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学分。这些努力得到了许多基层举措的支持，比如说喀隆大学（Kiron University），这是一所为在德难民提供教育的免费在线大学，它与实体大学合作，如罗斯托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stock），提供获得认可的学位。

凭借众多举措和项目的帮助，难民们在其教育和职业发展中更加活跃。然而，由于融合并非单向的，大学还需做好准备以帮助新的学生适应校内外生活。

注：此处言论不代表德国一体化和移民基金会专家委员会观点。

高等教育欺诈与腐败带来的灾难

Goolam Mohamedbhai

毛里求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uritius) 前任副校长、非洲大学协会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 前任总秘书长

电子邮箱: g_t_mobhai@yahoo.co.uk

任何行业、领域都难逃欺诈与腐败的魔掌,更别谈那些对社会福利具有直接影响的领域了:健康、教育、体育、政治和宗教。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为寻求资源和追名逐利而导致的腐败已臭名昭著,为高等教育机构带来了巨大压力。无论欺诈与腐败是否有罪,在某些情况下,腐败已侵入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并对科研成果和毕业生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这句引用选自透明国际组织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2013年全球腐败报告:教育面临着腐败》(2013 Global Corruption Report: Education captures the situation)。腐败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已持续了数十年。而不为人知的可能是其规模、程度及不断增加的趋势。高等教育腐败屡屡见诸报端,每个星期都有此类新闻出现。内容涉及的不仅是单个学生、教师,而且是整个学校,甚至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腐败甚至已跨越国界,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而浮出表面的问题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即便动机和参与者各不相同,但高等教育腐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同样的影响。简单说来,在西方,腐败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高等教育商业化之中,出现在把大学转化为公司性质的盈利机构渐增的趋势之中,也出现在大学和产业界的紧密联系之中——后者常为前者提供科研资金并借此控制其科研活动。在发展中国家,腐败通常滋生

于这样的压力之中,学生渴望进入名校,特别是专业项目,一旦获得录取,便希望能顺利完成学业。腐败也滋生于教师必须做出的行为之中,通过发文和科研活动来增加额外收入、提升学术地位。

全球扫描

快速扫描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的教育欺诈和腐败问题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局面的严重性。

澳大利亚。2015年4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四角计划”(the Four Corners program)披露了澳大利亚大学如何通过腐败做法建立其标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大学承受着这样的压力,它们为了获得急需的资金,需要招收外国学生并确保这些学生通过考试。“四角计划”给出的例子包括欺诈性招生机构,从大学毕业的不专业的或是不合格的护士、广泛存在的抄袭、作弊及剽窃。该项目被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欺骗性学位”。2014年,一则报道揭露了澳大利亚移民服务内部和外部的欺诈和腐败是如何使成千上万的外国学生取得澳大利亚非法永久居住签证的,正因如此,澳大利亚的毕业生纷纷失业。

俄罗斯。2014年9月,一篇发表在在线期刊《国际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上的文章描述了现代俄罗斯高等教

育腐败令人震惊的情况。文章写道，近50%的俄罗斯学生——在2008/2009学年约为750万人——会面临腐败问题，并且整个行业中的腐败金额足以等同于一个小国的教育预算。文章列举了高等教育领域中大量的腐败行为，提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学院院长通过一个博士录取名额收取了3万欧元的贿赂。文章中还提到，根据莫斯科警方的反馈，每年约有30~40名教授因篡改考试成绩受贿而被捕。

非洲。据报道，2015年5月，南非当局关闭了42所提供虚假及未经授权的项目的冒牌院校，包括三所据称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大学，它们在15天内提供学位。尼日利亚拥有非洲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在这里，学术人员间的腐败问题最常发生的领域包括升职、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通过课程讲义和考试分数勒索钱财、性骚扰等。2012年，来自三所东非大学的475名学生参加了一项匿名调查，大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承认抄袭和伪造参考文献，25%的学生在考试中串通以交流答案，5%的学生在考试中为他人代考。即便是在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国，欺诈仍然存在。几个据称是印度私立大学的分校正在被关闭，它们在没有获得印度当局认可的条件被设立于毛里求斯，其提供的学位在这两个国家都不被认可。

中国。2015年，电子期刊《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中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腐败就是一颗“恶性肿瘤”，自20世纪90年代起，腐败就已对中国大学的学术活动造成了严重影响。就科研而言，文章给出的例子包括抄袭、科研人员将科研经费中饱私囊以及在研究人员任用上徇私。以前在中国，教授通常享有极高的地位，其收入和条件都与政府高

官相当。然而，自1998年起，教授等级分化为六至八级，这在学术界独一无二。这带来了教授人数的急剧上升，随之而来不仅是其地位的下降，同时也催生了许多人通过个人关系而非学术成就获得升职。同样，博士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已导致腐败行为出现在教育部批准博士授予点的过程中，并且腐败行为也出现在了博士生导师的任命中。

印度。“维亚帕姆舞弊案”(Vyapam scam)才刚被披露，这可能是印度最为轰动的腐败丑闻。维亚帕姆是印度中央邦马德雅省的一个政府机构，负责开展公务员考试及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入学考试，包括很受欢迎的医学院的标准考试。先前就有关于维亚帕姆违规行为的报道，但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这一招生和招聘舞弊案的规模之大，它涉及了政客、商人、资深官员以及2500名代考人员。超过2000人已被捕。更糟的是，数十名直接与该案相关的人已经死了，一些人涉嫌谋杀和自杀案件。这一案件现已交由印度中央调查局(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接管。

学位工厂

老牌大学虚假学位证书的出售，以及那些无需学习即可提供假学位机构(一般称之为“学位工厂”)的存在现已广为人知。有报道称，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政客、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资深官员都在购买假学位。大多数学位工厂位于北美和欧洲，其他的则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隐蔽位置。还有这样的一些教育机构正在运营，它们未经认证或是已获得了虚假认证机构(即“认证工厂”)的认证。

迄今为止，阻止学位伪造者和学位工厂的尝试已获得了一点成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UNESCO) 建立了一个信息门户, 列出了世界各地获得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 这相当实用。维基百科也在其网页上给出了以字母顺序排列的世界上未经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名单。维基百科上也有一份类似的未经认可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的名单。尽管这些名单都很有用, 但维基百科网站上信息的合法性是不确定的, 且网站自己也承认这些名单可能不完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哪个机构列出了学位伪造者或是学位/认证工厂的名单并将其公诸于众, 毫无疑问, 学术机构害怕这一举动带来的法律和政治影响, 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伪造学位的机构通常短暂存在, 随时都有可能消失。

未来的路

抗击高等教育腐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主要是由于高等教育涉及了许多不同的、高等教育界内外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但是, 斗争是必须的, 因为如果高等教育腐败不受限制到处扩散的话, 它对国家和世界带来的后果必将十分严重。现在, 在院校、国家和全球层面已有一些应对高等教育腐败的行动, 我们需要加强和扩大这类行动并广泛分享经验。

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airobi) 已制定了一项覆盖整个大学活动的反腐败政策文件, 其中有专门针对教学和开展考试的内容。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 毛里求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auritius) 就有了一个透明、计算机化的选择系统, 它选用应试者的中学文凭作为所有项目的录取依据。Turnitin 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抄袭检测系统, 另外网上也有其他几个免费的抄袭检测工具, 如 PlagTacker 或 Anti-Plagiarism。博兹瓦纳小型的私立大学——波松大学 (Botho

University) 已建立了学术诚信小组, 并通过 Turnitin 的使用和简要的抄袭政策有效地减少了抄袭。

在全球层面, 透明国际已经建立了反腐败服务台 (Anti-Corruption Helpdesk), 根据订阅者需求, 为他们提供与任何腐败问题相关的可用研究。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已设立了在线的高等教育腐败监测仪 (Higher Education Corruption Monitor), 作为意识培养与信息交换的平台, 它为人们提供世界范围内有关高等教育腐败的最新资源 (新闻、文章、视频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规划教育研究所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Planning) 也有一个基于网络的资源平台 ETICO, 针对的是教育的伦理和腐败问题, 包括高等教育在内。设立于美国的高级认证委员会 (Council for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在其网页上有一个关于学位和认证工厂的专门板块, 2009 年, 该委员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起发布了一项声明, 内容是关于如何阻止高等教育中的学位工厂的。而近期, 就在 2015 年 7 月, 美国高级认证委员会国际质量团队 (International Quality Group) 发表了一份政策简报, 简述了质量保障如何在打击高等教育腐败中大显身手。

2015 年 3 月, 国际规划教育研究所组织了一次“规划高等教育诚信”政策论坛 (Policy Forum on Planning Higher Education Integrity), 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60 多名专家和利益相关者, 讨论了在应对高等教育欺诈和腐败上的最新举措。在论坛结束时, 与会者们呼吁建立一个高等教育诚信国际联盟。现在是时候向前迈进, 建立这样一个联盟以制定合理战略、政策及行动来对抗腐败这场灾难了。这一联盟或许将由透明国际发

起，由所有主要的曾处理过高等教育腐败问题的协会和组织组成。该联盟的指导原则应

该是这样的，高等教育既不是商业也不是工业，它是一项充满价值的社会公益事业。

东亚“毒性”的学术文化

杨锐

中国香港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教育学院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跨界/国际参与教授、副院长

电子邮箱: yangrui@hku.hk

东亚大学近年的发展让学术界印象深刻。东亚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进步既是人们可以感知到的又是真实的。然而,在媒体上的和文献中的宣传与报道还是需要推敲的。问题仍然是关于亚洲大学的真实潜力以及它们是否真的能够打破西方霸权的束缚。在认识到东亚社会过去几十年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巨大共同进步的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其面临的一些挑战。人们还未充分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目前在东亚盛行的“毒性”学术文化会如何削弱东亚大学未来的成功。

普遍的东亚大学文化

学术文化指的是学者们在其工作的方方面面中所持的态度、信念及价值观。学术文化对于做什么、怎么做以及谁来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涉及实际作用和象征意义层面的决策、行为和沟通。人们选用了大量的词语来描述东亚大学的学术文化,比如说,廉正、道德、行为不端甚至腐败。学术氛围常被认为是东亚高等教育进入世界领先地位的重大障碍。腐败的学术文化大大损害了院校地位和学术社区。东亚大学普遍缺乏的是基于精英价值、自由探索和竞争的学术文化。

在整个东亚,学术不端是由来已久的问题,涉及范围从学生作弊到科学家的欺诈行为。研究表明,学术不端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不断增加。韩国为自己起了这样一个绰

号——“抄袭共和国”。也许在世界范围内,日本大学和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得最好,他们已发展了一个社会系统,有效确保秩序和合理的行为。然而,日本也难逃学术欺诈的魔爪。在本世纪头十年中,有许多备受瞩目的学术不端案件的公开报道。最近,日本学术机构被小保芳晴子(Haruko Obokata)的数据伪造、图像篡改及抄袭所震惊。

学术不端在中国大陆地区尤为严重。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术文化快速变得颓废起来,这种“腐坏的”文化从区域性一流大学蔓延到国家顶尖大学,深深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之中,并渗入大学运作的方方面面。这种文化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现实,它以多种形式出现,影响了学生、教授、院士及院校领导。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较之于从事纯粹的学术工作,升职进入政府部门或是留在学校但身兼行政职务都意味着更加丰厚的酬劳和奖金。因此,中国学者更易陷入对行政地位的追逐之中,而不是投入时间进行正当的学术研究。

毁灭性影响

处于腐败学术文化的影响之下,对“关系”的利用,限制了教职工、学术及资源的自由流动,也限制了教师的职业发展。决策不是基于学术成就,而是基于个人关系与优先待遇。科学结果的抄袭和造假不足为奇。

那些身居要职的人瓜分了主要的科研经费。留给辛勤工作者的机会少之又少，学者们急功近利，日常行为中也充斥着不端行为。这种毒性文化对高等教育发展及地区的现代化项目有着毁灭性的影响，导致了院校和系统层面的扭曲和效率低下。这些行为打击了个人及院校的斗志，摧毁了东亚大学的学术氛围，荼毒了年轻学生的思想。从成功中保持地区尖端科学的发展非常重要。

作为对猖獗的学术不端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教育政策已开始强调阻止科研不端行为的必要性。例如，21世纪以来，通过制定标准和规则、设立专门机构、发布政策文件、组织国家论坛或研讨会、加强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已加大努力建立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人们愈发意识到东亚这一严重的问题，部分东亚大学已建立其自有的机构以处理学术欺诈和腐败。鉴于这一问题在社会中的广度和深度，期待一些积极的即时影响合情合理，但期待这些问题能在未来数年得以彻底解决则是不切实际的。

尽管有一些丑闻，但日本在学术文化上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这就说明了为何日本在东亚表现最好，日本无人企及的21项诺贝

尔科学技术奖印证了这一点，而在2014年前，其他东亚国家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早期的诺贝尔奖都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获得的。同样，在区域开展的、最新且仅有的诺贝尔科学技术奖在2015年授予了中国科学家。因为她的工作几乎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完成的，那时的中国正遭受着经济困难和政治孤立，所以，她的成就并不是中国当前学术氛围的成果。

结语

学术文化事关重大。东亚的腐败学术文化直接损害了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对其日常运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是东亚唯一拥有良好学术氛围的国家。不幸的是，尽管东亚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但解决这一广泛且深入的社会问题已然超出了高等教育领域的范围。毒性学术文化是东亚高等教育最大挑战的又一反映：大学还未领悟到如何把西方高等教育的“标准规范”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西方的大学概念仅仅是因其实用性而被采用。东亚高等教育的发展根本上是关于西方和本土高等教育文化之间的关系，在管理这一关系上东亚国家任重道远。

国际高等教育和“新自由主义转向”

Peter Scott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教育学院 (Institute of Education)

高等教育研究教授

电子邮箱: P.Scott@ioe.ac.uk

国际高等教育的原始形态是高等教育最为理想主义、甚至是最为利他主义的一个方面,强调的是教职工和学生流动以及跨国大学合作。凭借帝国大学在培养殖民地(最终后殖民的)精英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帝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能力建设以及对精英阶层的继续培训中的作用,中世纪流浪学者的神话理想得到了强化。现在,国际教育或许是高等教育与市场 and 竞争最为相关的一环;国际教育领域的术语现由国际学生和全球大学排名的“市场份额”讨论所主导。国际高等教育认识和实践的转变相当彻底,在未受到任何非议的情况下被人们顺利接受。

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对高等教育的影响,远离20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市场和福利国家的趋势是对经济衰退、萧条和世界大战做出的回应。并且,引人注目的是,这一趋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中幸存下来。在英国,现在有着一种强烈的、有时是备受争议的观念,即大众高等教育的理想,即以“一种仍可感知到的维多利亚式逻辑理解民主、社会公平和个人“提升”,这样的观念与当今时代所强调的“财富、时代、发展和竞争力”的主导观念格格不入、不受关注。在国际环境中,同样的事也在发生。国际教育以前的理想——团结、发展、相互理

解——已被新的市场要求所取代,这些要求是在过度使用的“全球化”一词中总结而来的。

三大转变

“新自由主义转向”有许多伪装,从思想僵化到灵活务实。它就像“广教会派”一样无所不包,由真正的信徒和表面顺从的怀疑论者组成。对一些人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必须作为主要的,或许是唯一的未来发展的推动者而受到高等教育的拥护;对另一些人来说,作为不可避免但却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人们必须适应它。因此,“新自由主义转向”的简化定义相当危险。但有三大主要趋势非常明显:

第一,从战后“福利国家”向所谓的“市场国家”的转变。“福利国家”出现于人们对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共同的记忆和团结中。这涵盖了结构和文化改变。结构改变包括撤消高水平的个人税务、随之增加的国家借贷(以及借贷对财务市场的影响)以及缩减的公共资助服务。文化改变包括对国家核心目的再定义,它经历了体现在公共利益中的传统国家观念到国家既是“监管者”又是“消费者”这一观念的转变。

第二,全球化(实际上,它所指的东西比现在的、过于激动的描述更久远和复杂)。久远是因为“世界社会”在过去就已存在,

也因为全球市场至少在 500 年前就已形成。更复杂的则是因为全球品牌和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十分微妙，也因为全球化形式多种多样。一些“另外”的全球化与明显的霸权自由市场的地缘政治形式不一致，在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案例中相当暴力（反过来说，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将“国家安全体制”现在的可怕现象合法化了）。全球化话语的影响之一是把所有的商品及服务都当作是可交易的“商品”。尽管关于把高等教育并入《服务贸易总协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协议之中的争论已缓和下来，但可以肯定的是，高等教育迟早会出现在有关美国和欧盟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以及相关的跨太平洋贸易条约的讨论之中。

第三，沟通的变革，或者更广泛地说，交际文化的变革。这包含了许多分支：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作为“名人”和“品牌”的政治媒体化；传统的基于印刷的“文化素养”的减少（悲观主义者可能想得更多，他们会哀叹“理性”的丧失）；“虚拟”社区的建立（对科学极为有益，但“网络性爱”和“网络犯罪”的情况中就很糟糕）；传统机构（如政党或是工会）的“空洞化”、“水平”和“即时”连接（得益于谷歌等公司）取代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等级。

对高等教育造成的影响

最终，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高等教育现在必须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环境中开展，再也不像半世纪前我们的大众教育系统最初建立时那样了。但是，这些新环境带来的影响不单只是单一市场的

一个驱动力。

国家本质的改变无疑削弱了其维持高等教育公共系统的能力。“公共”和“系统”的观念都被削弱了；“公共”观念被削弱是由于它似乎意味着公共提供的或是公共资助的服务，“系统”观念的削弱则是在于它似乎需要一定程度的自上而下的“规划”，这与“市场”的自由运作不相符合。但是，来势汹汹的高收费制度的推进还是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与智利和德国不同的一些国家也已取消了高等教育的费用（智利和德国实行免费的公立高等教育）。此外，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力已以更为严苛的监管形式重新出现。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多重且模糊不清的。它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例如，跨文化学习或是跨国教育。但国际化也带来了新的障碍——最明显的就是在移民控制上。尽管自由市场全球化现在是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但其他形式仍然存在或可能出现。抵制“新自由”转向的新国际化，或是建立于环境、平等和伦理关怀上的以团结为特征的新国际化已经出现了。

最后，交际文化的改变已从根本上塑造了学生的期待及他们的学习模式，同时也对高等教育的传统结构提出了问题。现在，我们对于这一转变的理解主要是基于慕课（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s）、电子技术支持的诊断工具、为“满足”学生消费者的需求而对微调的高等教育进行的数据分析；网络学习和网络评估的机制。但是，沟通变革还有其他内容，例如，开源和即时发表、全球科研联盟或与“用户”社群更强互动的潜能——与之伴随的是更多的集体主义内涵而非商业意义。

联合国、国际高等教育和知识外交

Nanette Svenson

美国杜兰大学 (Tulane University) 兼职教授、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及其他国际组织咨询员

电子邮箱: nanette.svenson@gmail.com

近年来,“知识外交”一词的使用愈发频繁,常被用来描述许多事物,包括高等教育如何成为软实力的一种手段、如何成为一种工具。凭借高等教育,较小国家可以在超越原有实力基础之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协商。作为世界外交的核心代表,联合国理应被纳入这些讨论之中,讨论与知识有关——甚至是与高等教育有关,尽管该领域通常与联合国关联不大。社会学习的推进、“中心—边缘”知识迁移、科研开展以及公共关系的增强都推动着联合国参与到高等教育规划之中。本文分析了该活动的本质,并对这些活动中哪些方面在推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实现目标上具备更多潜能进行评论。

大学学位项目

联合国参与的国际高等教育活动围绕着大学培训与学位授予展开。通过与其他学术和专业组织合作,联合国已建立了大量的项目和学校,目的是在全球治理和发展的关键领域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并使之与国家学术机构的项目规划相辅相成。

作为全球智囊团和研究生教育组织,联合国大学(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建立于1972年。联合国大学总部设于东京并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资助,它在不同国家拥有16个合作院校和项目,关注的问题涉及和平和安全、人权、治理、科技以及可持续发展。尽管联合国大学在2012年开始授予硕士学位,但其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合作院校的科

研上。位于哥斯达黎加的和平大学(The University for Peace)由联合国大会(the UN General Assembly)于1980年建立,授予和平与安全学科的本科学位并参与非学位项目和科研工作,它通常与国际伙伴进行合作。世界海洋大学(The World Maritime University)位于瑞典,是一所授予研究生学位的海洋研究院,它由国际海事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于1983年建立,该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世界海洋大学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缺乏合格的海洋专家这一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它提供了多种硕士学位和职业证书。国际海事组织也于1988年在马耳他建立了国际海事法律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Institute),旨在培训国际海事法律专家。国际海事法律研究所提供本科学位、海事文凭以及各类短期课程。同样,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国际培训中心(International Training Center)在2009年建立了都灵发展研究院(the Turin School of Development, TSD),目的是引入一系列有关国际劳工立法和发展的研究生项目和课程。都灵发展研究院是意大利都灵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urin)、一些其他院校及各类联合国机构合作的结果。

所有这些联合国大学项目都申请了当地和国际认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教师和学生,开设了与联合国知识及目标有关的新学位项目。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项目培

养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千名毕业生，开展了许多国际会议和科研项目，并主办了多种学术出版物。

非学位项目

除了授予大学学位和科研项目外，联合国还启动了另外的高等教育举措以支持短期活动并推动其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合作。这些举措包括联合国学术影响力（the UN Academic Impact）、模拟联合国（Model UN）、联合国实习项目以及由联合国资助的教师职位和课程建设项目。

联合国学术影响力项目始于2010年，旨在更为紧密地将大学与联合国联系起来、促进联合国目标的实现、创建关注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大学网络。世界范围内近1000名学者已参与进来，同意设立与联合国在教育、全球公民、可持续发展及冲突解决等原则上相一致的新项目。例如，乌克兰为贫困儿童提供的国家大学学前教育、康奈尔大学近期设立的国际建筑和农村发展专业（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模拟联合国几乎与联合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模拟联合国是一个由联合国支持，进行外部管理的教育模拟系统，以联合国体验和大学及高中学生学术竞争为特征。模拟联合国教授联合国原则和协议、培养科研和辩论技能、拓展参与者在外交、国际法和全球政治方面的知识。模拟联合国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每年举行，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参加。联合国实习项目是联合国高等教育规划的又一组成部分，由联合国秘书处（UN Secretariat）、专门机构和所学专业与联合国主题相关的毕业生区域中心提供。学生提供无偿劳动以在联合国分支机构获得工作经验和学分。联合国学术影响力项目、模拟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实习项目都努力以联合国活动、目标及事业来培养大学生，希望培育出

更具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一代。

另一些联合国高等教育非学位项目包括教师合作交流与课程开发。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学结对和网络计划（The UNESCO university twinning and networking scheme）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中增加了一系列教师职位和网络社区。该项目涉及120多个国家的650所院校，并通过赞助和交换机会，主要是在教育、科学、文化及沟通等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地考察相关的领域，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和科研能力建设。此外，一些其他在特定领域有专业知识、信息和教育经验的联合国机构正开始与大学合作开展拓展课程的项目。此类事例包括：国际反腐败学院（the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Academy），这是一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国际刑警项目（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INTERPOL project），在反腐败研究中提供广阔的专业培训课程和研究生行政课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the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对食品安全、数据分析和在线课程发展的指导。发展中国家的院校已充分享受了这些能力培养服务。

知识外交潜能

联合国国际高等教育知识外交活动涉及各类项目规划且这些活动相对较新。尽管如此，考虑到这些活动在推动联合国及其成员国理想和目标上的潜力，我们可以提出一些看法。在联合国的任务和经验基础上，它并不传播高等教育；因此，任何联合国大学项目都是依赖于其所在国的资助及外部资源。这耗资巨大且有时难以维持。同时，联合国的学位还未得到高度认可，且联合国面向大学的科研活动并没有得到其最为广泛的推广和利用，这引发了有关成本——效益合理性的问题。

在与国家经济、学术机构和专业人员而

非联合国生成的事宜直接相关的项目和问题上，联合国高等教育工作的产出最为丰富。因此，联合国通过高等教育专业专家及信息交换获得的非学位拨款似乎是一个更自然且性价比更高的组合方案。这样，两方高校都能获得联合国提供的资金、网络、信息、问

卷及高等教育交流的出版物，并且，这些活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样一来，联合国的信息、经验和基础设施必然有益于国际高等教育项目；但联合国如何充分包装及推销这些资源以获得最佳效果，这一点尚不明确。

国际教育研究变化的格局

Douglas Proctor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国际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douglas.proctor@ieaa.org.au

由于世界高等教育格局的不平衡性,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有其自身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 令人不安的是, 国际教育研究中的主要领域还未被记录下来。

近期对 IDP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研究数据库 (IDP Australia Database of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 国际教育研究明显集中于英语国家——在 2011~2013 年间发布的科研项目中占总数的 53%。同样, 尽管国际教育本身的多领域性, 它仍与高等教育领域紧密相关。学生也是此类研究的主要关注点, 而教授学生的教师、雇佣学生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或是学生所在院校更广泛的国际化议程等都不是关注重点。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于 2014 年发布了第三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院及学术项目全球目录, IDP 国际教育研究数据库的分析结果与目录中的结论相似, 即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集中在一小部分国家且讨论的主题范围狭小。因此, 正如失衡的全球高等教育格局一样, 国际教育研究的格局似乎既不均衡也未得到充分探索。

数据收集

该分析是基于 IDP 国际教育研究数据库数据, 涵盖了世界范围内与国际高等教育各方面相关的超过 13 300 本/篇书籍、文章、会议论文及报告。作为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近期所开展项目的一部分, 并以其国际教育研究网络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 举措为旗帜, 该分析对 2 511 项研究的数据库记录进行了详细分析, 这些研究是在 2011、2012 及 2013 年发布的。

当然, 该分析中有几点需要注意。由于该分析是由澳大利亚发起并赞助的, 所以, 国际教育研究数据库中有着较多的澳大利亚数据。然而, 数据库也一直引用其他国家的研究项目, 并且, 随着时间推移, 对非澳大利亚国家研究项目的数据也在稳定增加。即使这样, 目前数据库仍仅引用了英语国家的数据。

下面的结果是基于对数据库记录的详细分析, 包括关键词或短语、重点国家、研究方法以及出版物类型。除非另有说明, 所有数据都是三年的总和。

主要结果

2011、2012 和 2013 年发表的研究文章中记录了约 3 831 个独立的关键词, 平均每条记录的关键词为 7.3 个。尽管 63% 的关键词仅使用了一至两次, 但分析最常见的关系词揭示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以及研究热点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因此, 基于使用次数超过 200 的 21 个关键词/短语可以发现, 研究主要关注的是高等教育中的国际学生, 其次关注的是国际化和 (本国学生) 海外留

学/学生流动。年度趋势表明这些关键词的使用频率持续上升,而其他主要关键词(如“教育市场”和“文化差异”)的使用频率则在显著下降。另一些重要的关键词保持稳定的使用率,包括“教育政策”、“学生态度”、“全球化”及“学生体验”。

在地理重点上,数据库中的每条记录都显示出(有关的)作为研究主体的国家或地区。这并非完全与研究者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应,尽管这两者间有着密切联系。在涉及的三年时间内,我们列出了142个单独的国家/地区。其中,35%的国家/地区仅出现一次,而六个最为频繁的国家/地区(澳大利亚、美国、英国、中国、欧洲和加拿大)出现了超过100次。对这六个国家/地区的年度趋势分析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美国和英国,而对澳大利亚的关注相应地下降了。无疑,这部分是与数据库吸纳了更多的非澳大利亚研究有关。对中国、欧洲和加拿大的关注度基本上没有变化。

从地区角度来看,28.2%的研究关注的是大洋洲,其次,23.9%的研究关注的是亚洲或某个亚洲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欧洲(21.2%)和北美洲(16.8%),而对其他国家的关注微乎其微。在所有的国际教育研究中,不到10%的研究关注的是非洲、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

关于研究方法,国际教育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和访谈是尤为普遍的做法(在记录中分别占20.6%和17.6%);然而,结合起来看,许多定量研究方法(包括调查、学生调查、问卷和数据分析)占有所有研究方法的26.5%。虽然如此,由于2012~2013年间在个案研究和对比分析中使用访谈的频率急剧上升,年度趋势表明,定量研究已变得不那么普遍了。

关于出版物类型,国际教育研究的首选出版物是期刊文章,占有所有出版物的49.3%。书中章节(16.3%)和研究报告(15.1%)是第二普遍的出版途径。在其他出版物所占比例保持平稳或有所下降的时,期刊文章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由于国际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在各类出版物中都能觅其踪迹——在2011~2013年的数据中就有420本独立刊物和199个独立的研究报告出版单位。然而,该领域的主要刊物是《国际教育研究》(*the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国际高等教育》(*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出版)以及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NAFSA)的《国际教育者》(*International Educator*)杂志。尽管英国文化委员会(*the British Council*)、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及许多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出版的研究报告数量位居首位,但由于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出版了六本为其增光添彩的著作,所以其为成果最为丰硕的出版单位。

结语

正如收集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项目的国际比较数据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获得准确的国际教育研究图景也一样困难。尽管分析IDP国际教育研究数据库是个良好的开始,但是在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上有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尽管如此,该分析仍表明了近年来国际教育研究的规模,并且,我们从中学到了国际教育领域研究主题、方法、出版物类型

上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显示了国际教育研究的不均衡格局。虽然国际教育领域的未来发展尚待规划,但接下来纳入2014年数据的分析应该能帮助我们认识国际教育研究中的变化趋势。

注:2011~2013年IDP国际教育研究数据分析的完整报告及包含2011~2014年国际教育研究趋势的信息图表可见国际教育研究网络(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 IERN)网站:www.ieaa.org.au/iern。

人文教育的传统及其全球相关性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科研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人文教育正以适当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复兴。在专业教育和通识或自由教育的斗争中,专业教育明显胜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学习旨在为人们的工作、且通常是特定职业做准备。而且,高度专业化的课程在许多国家占据主导——学生进入专门的院系且其所有的课程都以特定学科为导向,培养的是在该领域具备专业知识的毕业生。有些国家,如美国,保持着对教育理念的一些承诺,即教育是为了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并得到智力能力的提升——这就是人文教育的基本概念。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人文教育的理念在全球高等教育讨论中获得了新的关注,背后的原因有好几个。人们愈发意识到劳动力和受教育的个人都需要“软技能”和与职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包括进行批判性思考、有效沟通、整合各种学术和文化信息、分析复杂的质性和量化概念的能力。此外,21世纪的经济不再为固定的职业路线提供保证。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多样、复杂且易变的就业市场。专业课程在培养人们进入需要创新能力的新知识经济上已力不从心,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创新能力需要更广泛的跨学科知识——这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基本理念的复兴。

迄今为止,尽管各院校千差万别,人文教育适度的全球复苏很大程度上——但并非完全——集中在高等教育的精英部门。

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还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定义。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种获取知识的途径以及更为详细的课程术语。人文教育通常可以追溯到西方传统之中——例如苏格拉底对于“被检视人生”(the examined life)价值的信念,以及亚里士多德对“反思公民权”(reflective citizenship)的强调。正如此处所讨论的一样,人文教育也有必不可少的非西方传统。当代人文教育的拥护者们关注批判性思维的价值,关注重要的科学与人文领域广泛的知识,人们需要这些知识去理解后工业社会的复杂性。在最为广泛的层面上,人文教育与更为狭窄的以职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方法形成了对比,而后者现已主导了21世纪大多数人的想法。人文教育的拥护者们认为教育不只是“为工作做准备”——现代社会对于高等教育需要的是涵盖范围更广且更加完善的教育方法。

非西方人文教育传统

也许,教育哲学最早的例子与来自中国的现代人文教育类似,中国的儒家传统强调人文教育,以广泛的方法获取知识。两项主要的中国教育传统都具备可被称之为人文教育的特点,即可追溯至2500年前的《论语》(the Confucian Analects),以及可追溯至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21年)的传统中国高

等教育。正如当时被人们所知的那样,《五经》(*the Five Classics*)是带有人文教育特色的书籍,它涵盖了许多“知识领域”。同时,儒家高等教育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它包括一些常识。因此,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强调的是对知识涵义的广义解读,在解读的同时也遵循儒家伦理和哲学传统。

虽然人们少有考虑,但古代西方和儒家思想中教育哲学的方法有着相似性。孔子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和发展人的本性,以使美德、智慧及道德完善都能实现”。尽管院校结构、课程以及高等教育的目的无疑都与人们现在对人文教育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我们可以提出以下观点,即培养拥有广阔知识面的学生这一承诺将中国高等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理念联系起来。

同样重要的是,如今的“高考”——国家大学入学考试——也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传承者。尽管高考备受争议,但它仍是中国的一大常规,与现有的人文教育理念几乎背道而驰;高考与其科举考试前身一样,都要求学生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

印度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处于不同的环境且带着非常不同的知识根源,1197年以前,那烂陀大学在印度东北部几乎兴盛了一千年。它反映了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主持了佛教讲座,并且,在其鼎盛时期,学校拥有1万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授。尽管学校的课程主要集中于宗教内容,但老师也教授学生广泛的知识,同时,学校欢迎许多拥有不同知识传统的学生和学者。佛教哲学把教育定义为“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以及一个通过获得知识将个人从“无

知与依赖中”解放出来以“发掘人类内隐思想”的过程。与儒家传统一样,那烂陀大学是带有专门关注点的哲学的又一个例子——在此指的是宗教知识——但同时它也带着这样的信仰,即有意义的教育也需要更广泛的学科知识。

世界上现存最为古老的大学是位于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the Al-Azhar University*)。该大学建立于975年,自其建立以来,它就是最为重要的伊斯兰思想中心。一开始,爱资哈尔大学不仅关注伊斯兰神学和教法,它也关注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因为这些学科与伊斯兰教有关。19世纪70年代,爱资哈尔大学新增了科学系。在大多数伊斯兰世界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课程是基于伊斯兰教的关注,但通常也包括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其他科目——这些教育机构意识到了综合知识在培养人才中的必要性,这反映了一种统一的教育哲学。

正如此处所表明的一样,在许多古老的非欧洲高等教育传统中,院校和教育者致力于那些包含广泛学科和知识的课程。尽管课程的中心、组织和具体要求差异巨大,但这些传统体现了从一系列知识传统中理解现实的承诺。

结语

在当代,以及迄今为止,重新思考全球的人文教育,丰富的非西方传统大都被人们所忽视,甚至当讨论是在亚洲开展时也是如此。重新思考高等教育课程的现有动机与21世纪人们的关注以及回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关,但人文教育的根本真理仍然有效,这与其在孔子、佛教以及伊斯兰圣人时期一样。

新民族主义：国际学生面临的挑战

Jenny J. Lee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高等教育教授

电子邮箱: Jennylee@arizona.edu

现今，在海外学习的学生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过去十年间海外留学人数增长了一倍，并且，这些数字预计在未来几年中会增长得更快。然而，随着国际需求的上升，大学在力争以更具国际性的面貌迎接其背景各异的学生上面临更多挑战。虽然有些文化调整是可以预见的，但是，较之于自身缺点所带来的问题，国际学生所属国环境存在的不足所带来的问题才是让他们手足无措的难题。尽管院校领导做出了巨大努力，但大学中的师生和当地社区或许还未准备充分或是乐意去接受这些被视为“外来者”的留学生。许多媒体都记录了对国际学生的抵制，常以歧视行为的形式出现，从一些不易发现的成见到身体攻击。

尽管大多数国际学生都有着相当愉悦的国外留学经历，但也有一些学生默默承受着留学带来的痛苦。基于最近一项对南非七所大学国际学生的调查研究，在问及被调查者如果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是否会告知他人时，32%的人表示他们不会告诉任何人。

区域流动性的上升

随着全球流动的上升，区域流动也在增加。进行区域内国际研究最为明显的就是欧盟 (the European Union)，但区域研究同时也在东亚、拉丁美洲、南非和世界其他地区展开。由于区域合作协议的签订、大学教学质量的提升以及跨国旅游的增加，区域中心开

始出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他们在希望获得国际学位的同时又能离祖国近一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对这些似乎不太像“外国人”的学生来说，歧视会少一些。较之于来自较远地区的学生，这些来自邻近国家的学生在面对诸如语言障碍、思乡成疾和文化适应等挑战时或许会更加从容。但事实并非如此。

新民族主义

在美国，较之于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学生，来自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常认为自己遭受了更多不公平待遇和敌视，我将此认为是新种族主义的形式。新种族主义的歧视不单是基于生理差异，它也包括在这个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差异。例如，新种族主义或许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学生与美籍华裔学生在美国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不同。然而，新种族主义并不能适用于国际学生在自己原属地区遭受歧视的案例。因此，我的最新研究已发现一种新的歧视形式，它与种族无关，却更多涉及到国籍。虽然民族主义指的是个人民族的认同，但新民族主义，与新种族主义一样，将此概念延伸至新的全球经济之中了。简单说来，新民族主义被定义为基于民族身份的歧视。随着国际化的加深，民族身份作为全球竞争的形式被再度引入并重新定义。换句话说，新民族主义可能会对国际学生的体验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学生

在其原属地区学习时。即便是学生与当地主流文化群体属于同一种族，不公平待遇也有可能发生，并且，较之于来自不同种族和地区的学生，情况可能会更糟。

韩国和南非的案例

韩国和南非是两个新兴市场国家，在移民上有大幅增长，其中包括留学生人数的上升。这些国家作为区域中心举足轻重，它们为邻国提供了国际高等教育。移民和跨国学生主要来自接壤国家。同时，韩国和南非，就像西方主要的全球目的地一样，也因对多余的“外国人”采取敌对措施而受到了负面报道。

韩国有近 8.6 万名国际学生，大多数学生（69%）来自中国。对比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较欧洲、北美、甚至是亚洲其他地区的学生而言，东亚学生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和更多的不公平待遇。而较之于其他国家的学生，包括其他东亚国家学生，中国学生尤为感到更加不受欢迎。一名中国学生解释道：“韩国学生常与西方国家学生交好，与日本学生相处得也不错。但他们与中国学生的关系就不是这样了。”人们对中国负面的固有偏见可能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同时，一系列的歧视性行为也显示了这些情况的存在。常见的例子包括：“我竭尽全力找工作，但由于我是个外国人，所以被拒绝了。事实上，当我们交谈的时候，主管并不知道我是外国人，但我坦诚相告了。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因为作为中国人而感到尴尬。然后，他们很快拒绝了我。”另一名学生说道，“宿管阿姨说她从不接受中国学生在此住宿，因为中国学生又脏又吵。”这些描述并不能理解为种族歧

视，而是民族歧视。

尽管同属一个种族，但这样的歧视是基于国籍的，而这类情况不只在东亚出现。在南非，近 7.3 万留学生来自非洲南部（74%），最大的国际学生输入国是其接壤国津巴布韦（27%）。正如在韩国一样，在南非的国际学生也受到了因国籍不同而受到的歧视。一名学生解释道，“津巴布韦人不受欢迎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挑战。”另一名非洲学生说道，“人们似乎对于我是尼日利亚人而感到不悦。”住宿是国际学生面临的一个常见问题；一名津巴布韦学生说，“我们作为外国人常常受到南非人的蔑视。在住宿问题上，我们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我们的住宿费是南非公民的两倍。”与其他国际学生相比，一名马拉维学生解释说，“比起非洲学生，本国学生更欢迎非非洲国家的学生……本国学生不与非洲国际学生交际。但他们总是对那些来自其他地区的国际学生很友好。”

复杂的未来挑战

尽管西方世界主要的留学国家一直努力把国际学生融入到当地学生之中，但类似的挑战仍存在于区域性留学国家中，尽管它们培养的大部分国际学生文化相似。虽然新种族主义可能会出现在主要的西方留学国家，比如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但新民族主义可能也会存在，特别是在那些作为区域留学目的地的新兴经济体中，比如韩国和南非。正如近来的一些研究显示的那样，国际学生面临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虽然如此，在这个愈加复杂的全球社会中，新种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是两大截然不同却又强劲有力的挑战。

东南亚学生流动面临的挑战

Thu T. Do、Duy N. Pham

Thu T. Do: 美国圣路易斯大学 (Saint Louis University) 高等教育管理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tdo10@slu.edu

Duy N. Pham: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姆斯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科研、教育评测和心理测量学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dpham@umass.edu

受到21世纪初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东南亚在学生流动上有了显著发展:出国留学的东南亚学生人数大幅上升,在东南亚的国际学生数量也逐渐增加。尽管学生流动项目带来的好处清晰可见,但在试图推动项目进一步发展上,东南亚国家面临着几项挑战。

近期发展

在美国留学的国际学生生源地排行榜中,东南亚国家位居前25位,包括越南(8),印度尼西亚(19)、泰国(20)及马来西亚(24)。直至2011年,这四个国家以及菲律宾的出国留学学生数量已达到了21.4万人,他们主要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学习。学生流动的增加催生了通过特许和结对协议而开展的国际合作教育项目,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外国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分校。现在,东南亚有25所分校:一所位于印度尼西亚,六所位于马来西亚,13所位于新加坡,三所位于泰国,另外两所位于越南。

东南亚不仅派送学生出国留学,同时也提升其国家学术系统以吸引外国学生。由于东南亚在高等教育中使用英语授课,加之该地区相对低廉的学费和生活费,东南亚国家在全球学生市场竞争中取得了很大进展。诸

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重要国家已致力于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它们已成为了教育输出国。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2014年,新加坡迎来了120个国家的52959名国际学生。同样,马来西亚新招了160个国家的63625名国际学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位列国际学生留学目的国前20位。在东南亚学习的大多数国际学生来自东南亚、韩国、中国以及印度。

尽管从西方国家到东南亚的国际学生流动数量较少(约5000人),但这一数字近几年在逐渐上升。这些学生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他们到新兴和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学习,如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此外,也有大批中东国家的国际学生进入东南亚学习,包括阿联酋、阿曼、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和黎巴嫩。由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美国随即对中东国家申请者采取了更具限制性的签证政策。所以,一些伊斯兰国家进入东南亚的留学人数逐渐上升。2012年,伊朗学生占菲律宾总国际学生数(6.1万)的21.44%。在马来西亚,招生专员扩大了对留学生的市场搜索范围,把目标对准了中东国家。

挑战

东南亚国家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市场国际化上取得了成功，上面提及的学生流动的增长就是明证。然而，东南亚国家面临的挑战阻碍了他们享受成果并继续发展跨国教育项目。

边缘地位。东南亚在知识生产中的边缘地位是最大的挑战，这也被认为是其他挑战的根源。事实上，少有东南亚国家成为新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的主要生产者。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前500强中，一直以来都仅有两所东南亚大学榜上有名，两所大学均位于新加坡。由于排名关注的是科研生产力和重大研究所获的知名奖项，因此，这反映出东南亚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推动知识发展和知识创新上明显处于边缘地带。

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的边缘地位也使其高等教育机构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魅力不足。例如，东南亚学生不太可能去其他东南亚国家攻读学位或是参与交流项目。比起在东南亚选择一所大学学习，许多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富裕家庭更倾向于将其子女送到东南亚以外的英语国家学习，以获得国际学位。这是东南亚高校面临的问题，因为他们把最优秀的或是最富裕的学生拱手送给了外国院校。

人才流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数据显示大多数学生从东方移动到西方，从非英语国家流动到英语国家。同时，许多优秀的东南亚教授和学术人员现在都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工作。这就是人才流失，尽

管人才流失问题在东南亚各国存在的形式各异，但它为这些国家带来了真正的挑战。在东南亚，越发达的国家，如新加坡，就越不容易令其最优秀的人才流失到日本或是西方国家。然而，在那些学术质量较低的国家中，大多数资质优良的学生和成就斐然的学者都到外国高校求学或是工作，这说明这些国家失掉了为创造与发展自身知名大学的人力和经济资源。越南大部分天赋异禀的学生和成果丰硕的学者都在国外学习或工作。例如，从河内和胡志明市最好高中毕业的学生几乎全部到国外接受本科教育。同样，大多数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s）中获奖的越南学生都以学者身份在发达国家工作。

语言障碍——英语。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大学并未将英语作为授课与出版的官方语言，这是东南亚吸引国际学生和参与到更广范社区中的又一阻碍。除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外，东南亚大多数大学提供的英语课程少之又少。这就是为何少有国际学生到这些院校参加交流项目，更不用说攻读学位了。如果在可接受的成本范围内提供更多英语课程的做法不成功，那么，可以预见的是，不把英语作为授课语言的大学将不会成为大批国际学生向往的留学院校。

至关重要的是，东亚国家应意识到本文提及的挑战。显然，东南亚国家应规划其高等教育政策以克服挑战，从而减少负面影响并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这是提升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水平和增加其对社会发展所做贡献的一个途径。

法国对国际学生学费的讨论

Ariane de Gayardon

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生科研助理

电子邮箱: ariane.de.gayardon@gmail.com

2012年有400万学生出国留学, 学生流动已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 接收国的国际学生数量越来越多, 这些国家开始思考其筹资战略。处于一个全球紧缩的时代之中, 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国际学生教育是否应该像本国学生教育那样获得补贴。

在2015年上半年, 这一问题在法国受到了密切关注, 当时“法国战略”(France Stratégie)的相关报告提议引入国际学费, “法国战略”是一个服务于法国总理的智囊团。法国并非是深陷这一争论的首个国家,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但它对法国有着特殊意义, 因为法国是世界上第三受欢迎的国家, 并且该国一半的国际学生来自非洲。

福利国家

在有关非本国学生高等教育经费问题的讨论上, 欧洲福利国家特别容易受到影响, 因为这些国家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大量的补贴, 这也被认为是一项权利。处于全球高等教育经济困难时期, 福利国家质疑它们是否应该在这些宽松的财务状况下继续接收国际学生。在北欧国家, 也即福利国家的代表中, 这类讨论无处不在, 这表明在过去十年中, 学费问题变得如此普遍。丹麦和瑞典目前已向国际学生收取学费; 尽管在学费试验期内

人们观点各异, 学生社团也对此进行抵制, 但芬兰可能会在2016年实施这一举措。

法国高等教育的状况

法国无疑是一个福利国家, 其高等教育系统向学生收取低廉学费。2014~2015年, 本国和外国本科学生每年学费约为210美元。事实上,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 法国政府在2011年为公立高等教育支出提供了80.8%的资金。据估计, 政府每年为每名学生提供的高等教育补助超过了1.25万美元, 远超20世纪80年代的7700美元。与这一趋势并肩而行的是持续增长的学生数量。很自然地, 正是在此种情况下, 谁应该获得补助的问题出现了。

2015年, 法国总理的智囊团发布了一项报告, 题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投资》(*Inves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该报告提议引入包含国际学生所有费用的学费制度。由此省下来的钱可用于提升大学的国际化。但法国环境有其特殊性, 这使得此项讨论尤为引人关注。

吸引了谁?

法国因其作为流动学生接收国的定位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2012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法国列为世界上第三

受欢迎的国家,吸引了400万国际学生中7%的学生。有趣的是,在该排名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些向国际学生收取高昂学费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在法国,国际学生学费这一问题掀起了轩然大波,部分原因来自这些学生的国籍。将近一半在法国学习的国际学生来自非洲,他们是法国过去殖民地时期的遗留物。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位居国际学生输出国前十位。这些学生几乎不可能支付超过1.25万美元的学费。事实上,当前即便缴纳极低学费,也有82%的国际学生在一项调查中表明,留学法国为他们自身及其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对这些想要且需要进入良好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生们造成的影响,想要增加学费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法国现正帮助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国家,为他们提供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因此,我们需要考虑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

然而,在法国看来,该权衡在于高等教育体系内国际学生数量和多样性之间。毋庸置疑,国际学生学费的增加将会对进入法国的流动学生数量造成影响。2015年的报告预计国际学生数量会下降40%,这一数字将很难回升。由于法国不能吸引那些有能力且准备支付学费的学生——特别是考虑到语言障

碍以及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吸引留学生方面带来的竞争,因此,国际学生因学费问题无法入学对法国带来的损失难以弥补。

最后,这一问题需要从经济角度好好研究。2014年,法国的国际学生带来的经济效益估计达到近50亿美元,去除学费,还可获利16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2015年报告估计的收取全部学费后可获的9.3亿美元。国际学生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值得法国为其教育进行投资。

结语

2015年7月,法国政府宣布留学生将继续支付与本国和欧洲学生同样的学费,以此终止了国际学生学费的问题。但这一讨论本身为未来建立国际学生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提供了可能。例如,芬兰好几年来一直抵制这一趋势,但它现在已决定在2016年9月开始收取学费。如果争论再度出现,法国需要再次思考国际学生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作用,也需要思考自身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培养外国学生中的作用。因此,该讨论不应只停留在经济辩论层面,也应关注高等教育系统、全球和国家公共利益、甚至是外交事务的多样性。

微观下的英国教学质量：驱动力为何？

Robin Middlehurst

英国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外部政策顾问、教授

电子邮箱：r.middlehurst@kingston.ac.uk

依据不同的测量标准，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通常在教学质量上深受好评。例如，在2015年的英国《卫报》大学排名中，119所参与调查院校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介于77.6%~93.3%，而最近的“2015全国大学生普查”（National Student Survey）表明，在156所参与调查的院校中，学生总体满意度介于74%~98%。国家绩效指标也显示出英国（总体）正在增加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关注的是学生发展与教育水平，并且已在其毕业生就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几十年来，英国一直拥有强大的外部质量审查机制，关注的是教学、学习、评测以及课程设计——在项目层面则是通过专业、法定及监管机构（PSRBs）——在院校层面通过质量保证署（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内外部质量保证受到综合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标准”（UK Quality Code for Higher Education）支持。此外，英国也是发展“国家专业标准框架”（National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ramework）的先驱，该框架对高等教育教学、学习与评测进行评鉴。完成相关课程的个人经“国家专业标准框架”认证后可以成为国家高等教育学会（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cademy）的会员，该学会是英国实现教育质量提升的国家机构。英国现有6万名高等教育学会会员，包括一名海外会员。

英格兰“教学卓越”的新举措

即便如此，英国还有三项重大举措正在实施，更为关注教与学的质量及其评估和测量。这些举措包括：“资助机构质量评估审查”（the Funding Bodies Quality Assessment Review, 2014/15年），提出内外部质量评估方法的根本性调整；新部长在伦敦提出的“教学卓越框架”（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它被列入2015年11月6日发布的“绿皮书”（Green Paper）中；以及一项针对这两项提案及其对高等教育系统潜在影响的议会调查（Parliamentary Inquiry）。这些新的发展催生了英国境内的辩论潮，无疑也引起了海外人士的关注。那么，它的驱动力是什么呢？

当然，英国没有明显的关于教学质量的“燃烧平台”，或是说恰恰相反。所有院校对教学、学习以及学生的教育体验质量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易变的政治环境中，尽管要找到变化的具体驱动力相当困难，但三组国家动力为英国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理论基础。有些还具备更广泛的国际共鸣。

政治视角

首先是政治驱动力，聚焦于英格兰。过去十年，在有着不同政治派别的政府管理下，英国高等教育放松了管制，新的私立院校获得了学位授予权、大学头衔以及学生助学贷

款机会。英国开始收取并提高了学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突显了高等教育系统从很大程度上的公共模式转变为逐渐加深的私人筹资模式，尤其是在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中。同时，科研经费已集中到少数院校之中；并在教学经费缩减时期受到限制。上一任和现任政府的保守党大臣已提出两点顾虑，事关高等教育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是这些政府政策带来的结果)。其一是关于收费和收费水平的资金效益；其二是关于科研重点和声望，或许是以教学为代价的，特别是从推动“科研卓越计划”(the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的激励政策来看的话。新的英格兰高等教育部长已宣布“教学卓越框架”应该重新平衡科研与教学重点及激励政策。

经济视角

其次是经济驱动力，仍关注英格兰，但有了更广的反响。2015年5月，新一届政府经选举产生，政府承诺继续实行为应对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紧缩政策。上述提及的资助变化是这一情况的一部分，可能很快会有更彻底的经费削减。为实现经费的大幅缩减并达成其他政策目标，包括推动市场化，政府正以潜在的更为彻底的方式努力改变高等教育系统的管理架构。其他的高等教育提供者在获得学生助学贷款和有关管理条例的“公平竞争舞台”上努力游说。另一方面，依据成本、负担和久经考验的质量，

“传统”大学已对减少外部监督进行了游说，希望转移到一个“基于风险”的质量保证体系之中。在资助机构对质量保证审查的范围内，作为英国可能采用的模式，美国地区认证系统和新澳大利亚基于风险的质量标准已被仔细研究。

社会视角

第三项驱动力提供了英国境内的社会视角，但却有着更广的国际共鸣。英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丰富多彩且规模巨大，学生数量稳步增加。然而，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已取得进步，但在全体学生的保留、发展和成功上或是在社会流动方面，现在的高等教育系统还不是一个公平的系统。弱势群体学生包括：低社会经济收入群体、黑人和少数民族学生、残疾学生。对已有的关于这些学生群体的数据加以分析，跨院校图景变得更为清晰；也更有可能会查明哪些院校系统使用这些数据以提升学生成绩，而哪一些院校没有这样做。当下所有的审查都提及了广泛使用测量标准以评测质量和教育卓越。

当然，还存在其他对于院校和政府相当重要的驱动力，比如说加快教学创新和维持对留学生招生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本文简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驱动力处于辩论的风口浪尖之上。不出所料的是，类似问题也存在于其他国家之中，包括有关美国认证的诸多批判和争论。

科索沃的高等教育：漫长的过渡

Khavit Rexhaj

科索沃 AAB 大学 (AAB University) 国际合作副校长

电子邮箱: khavit.rexhaj@aab-edu.net

科索沃的高等教育系统与其社会一道，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渡过程：从 90 年代末彻底覆灭且高度政治化的系统开始转变为新的高等教育系统，新系统努力为学生提供高质量教学，并致力于加入欧洲高等教育区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科索沃有 180 万人口，它是欧洲最为年轻的国家之一，45% 的人年龄不满 25 岁，超过 25% 的人不满 15 岁。依据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6.72% 的科索沃人口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相比起来略低于其他西巴尔干地区国家，这些国家中该比例介于 8~14%。1999 年内战过后的 15 年间，科索沃的高等教育系统招收了更多的学生，入学率从 2005 年的每 1 万个居民中的 12 人上升至 2014 年的 55 人。这一时期，科索沃的高等教育格局也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改革。

无计划扩张和结构变化

科索沃最初只有一所公立大学——普里什蒂纳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Pristina，建立于 1970 年)，2007 年有 27 000 名大学生。直至 2014 年，科索沃新增了七所公立大学，其中六所大学 (建立于 2010~2013 年) 采用阿尔巴尼亚语授课，另一所大学采用塞尔维亚语授课 (建立于 2000 年)，科索沃的大学在 2014 年共有 7.5 万名学生。同时，私立高等教育领域膨胀起来。在 2004~2015 年间，由当局许可和认证的私立院校 (称之为“学院”或“高等学校”) 数量从两所增至 25 所。私

立高等教育领域为大约三分之一的科索沃学生提供服务，主要是在本科和硕士阶段，且学生人数还在上升。

系统扩张与学生人数上升带来的影响

教育部以及科索沃统计局 (Kosovo Agency of Statistics) 只有极少的关于普里什蒂纳大学在 2008~2013 年间学生入学和毕业的数据，但这些数据仍显示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学生人数的增加似乎对教育质量和学生成绩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因为无论是实际上还是相对看来，毕业生总数都在下降。在 2008~2009 学年，5 161 名学生从普里什蒂纳大学毕业，毕业生的数量仅为 2005 年 7 000 名注册入学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二。同样，还是在 2008~2009 学年，普里什蒂纳大学招收了一万名新生。三年后的 2011 年，仅有 4 496 人，也即占 2008~2009 学年招生人数 44% 的学生从该校毕业进入就业市场。所以，入学人数在三年中 (2005~2008) 增长了超过 40%，而毕业人数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近 10%。数据表明，因对招生人数不加控制且该趋势一直持续至今，科索沃高等教育系统的绩效急剧下滑 (表现为消耗显著增加且毕业率降低)。

在 2008~2013 年间，公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几乎增长了三倍，但以下数字却没有相应增加：政府资助 (少于 40%)、教学人员数量 (少于 30%) 以及新的基础设施。科索沃的公立大学每年的生均支出在 300~500 欧元，

这一数字比其他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平均少了三倍，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少了15倍。直到2014年6月，公立大学的学生们也支付极低的100欧元（130美元）每年的学费。在2014年的国家选举中，为获取政治支持，政府缩减了50%的高等教育费用。结果，收取这些费用的过渡和管理成本超出了大学的所获收益。高等教育系统的扩张并未带来更多的资源。相反，现存的资源在急剧扩张的领域中重新分配，普里什蒂纳大学的教学人员和经费被分配到了更多公立院校之中。该情况对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一猜测是合情合理的。

边缘化研究

除了教学质量，学术表现和科研努力也降至最低。教育部长及其战略规划急切地宣称科索沃是一个“知识社会”。然而，在严谨的学术研究、有效可行的学习或技能上，科索沃的大学并没有为社会创造知识。相反，高等教育系统逐渐转化为了教学学院的松散组合，向年轻一代传输陈旧过时的东西。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大多数科研经费必然用于支持教学，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模式，科研失去了吸引力。

对许多学者而言，科学研究已成为确保快速学术晋升的途径，随之而来的是薪水的增加。因此，“开展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确保个人学术职业的稳定性。这一情况近年来变得更糟了，教授们，近来甚至是校长，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印度可疑的伪科学杂志上，用以为自己的教授头衔增光添彩。可是最近，媒体关注到了这些问题。2014年初，经历了国内和国际上

的学生抗议及众多的媒体报道后，普里什蒂纳大学校长辞职。而且，记者们也正积极揭露教授和大学讲师们的可疑行为。

高等教育系统的作用

增加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政府政策似乎已严重阻碍了高等教育系统。大学开始发挥其社会和政治作用，而非服务于学术目的。公立与私立院校中不断增加的学生人数并未带来毕业生及其就业的增加。作为技艺不精的劳动者，这似乎只是推迟了他们进入拥挤的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除此之外，在每个较大城镇建立大学或许会在选举时期带来选票，在2014年的国家选举中正是如此。但是，影响首都大学的这些问题也会在整个科索沃国家再次发生。

最新进展

在2014年，科索沃的高等教育有了许多更具潜力的发展。新的教育部长上任，普里什蒂纳大学也有了新的校长。在系统层面，新教育部长进行了一系列的法律和结构改革，新校长也参与到了大学的院校和学术改革中。由于一项充满价值的教育改革至少要七年时间才能看到成果，所以，这些努力的影响和效果如何仍尚待分晓。即便如此，它们还是为科索沃的高等教育点燃了希望之光。

注：本文在《迈入新时代》(Stepping Into a New Era, edited by A. Glass,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4 Conference Conversation Starter) 刊出。

新书速递

Clancy, Patrick. *Irish Higher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ubli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325 pp. Euros 28. ISBN 978-1-910393-04-8. Web site: www.ipa.ie.

本书从比较视角（主要是欧洲）对爱尔兰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分析。书中包含了最新的数据信息和叙述。书中讨论了以下主题：爱尔兰和更广泛视角下的高等教育扩张及多样化、准入问题、招生和保留、学生体验、学术职业、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资金问题等。

Cloete, Nico, Peter Maassen, and Tracy Bailey, eds. *Knowledge Production: Contradictory Functions in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frican Minds Publishers, 2015. 295 pp. (pb). ISBN 9781920677855. Web site: www.africanminds.org.za.

本书聚焦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型大学，分析了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主要关注非洲的八所“旗舰”大学。书中基于数据信息的章节主要涉及以下主题：这些大学的绩效、南非作为非洲博士中心的作用、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在知识生产上的学术激励政策、学生参与和公民身份、非洲科学委员会的作用等。

Dougherty, Kevin J., and Rebecca S. Natow.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Funding for Higher Education: Origins, Discontinu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57 pp. (hb).

ISBN 978-1-4214-1690-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绩效拨款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与具体成果上的院校绩效联系起来。在分析八所美国大学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作者探究了如何定义及评测绩效拨款，及其如何影响拨款。特别关注了该主题的政策相关内容。

Gerber, Larry G.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aculty Governance: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5. 250 pp. \$29.95 (pb). ISBN 978-1-4214-1462-1.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本书是对美国大学共同治理的历史回顾，书中指出，由于美国大学的组织和理念变得更加专业化，教师的权力与权威已经减少了。在19世纪，教师自身变得更加专业化，这增强了他们在大学中的权力和权威。近来，随着高等教育的企业化及扩张，教师们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Geuna, Aldo, and Federica Rossi.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conomy: Pathways to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15. 208 pp. \$120 (hb). ISBN 978-1-78254-948-2. Web site: www.e-elgar.com.

本书分析了大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途径，探究了大学的经济影响以及大学经济状况的内部要素。书中讨论的主题包括：校企知识转移、高等教育与经济福利、大学科研的经济作用及影响等。

Hall, Budd, Rajesh Tandon, and Crystal Tremblay, eds. *Strengthening Community-University Research Partnerships: Global Perspectives*. Victoria, Canada: University of Victoria, 2015. 305 pp. (electronic edition only). ISBN 978-1-55058-562-9. Web site: www.unescochair-cbrsr.org.

本书聚焦于社区与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对全球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书中包含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涉及阿根廷、巴西、加拿大、印度、南非、英国、美国、乌干达等国。这些案例引发了对于各类不同的合作伙伴关系及联系的讨论。

Jenkins, Laura Dudley, and Michelle S. Moses, eds. *Affirmative Action Matter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14. 221 pp. (hb). ISBN 978-0-415-50807-0.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education.

本书是对“扶持行动倡议”（改善高等教育中的种族、性别或其他群体的项目）的全球讨论，书中给出了案例研究及国家视角的综述。涉及的国家有南非、埃塞俄比亚、美国、巴西、印度及保加利亚。书中包含了有关这一主题实用的文献目录。

Keenan, James F., SJ. *University Ethics: How Colleges Can Build and Benefit from a Culture of Eth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5. 281 pp. (hb). ISBN 978-1-4422-2372-1. Web site: www.rowman.com.

本书作者凯南（James F. Keenan）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不常谈论道德规范，他提倡对大学生活的道德规范内容展开更加积极的讨论与分析。凯南特别关注学术欺诈的道德问题、本科生的不良行为、多样性与种族、竞技、性别等。

